

门，形成明北京城南北向中轴线。这些都是突出中央集权“皇权至上”思想的“北宋东京模式”的传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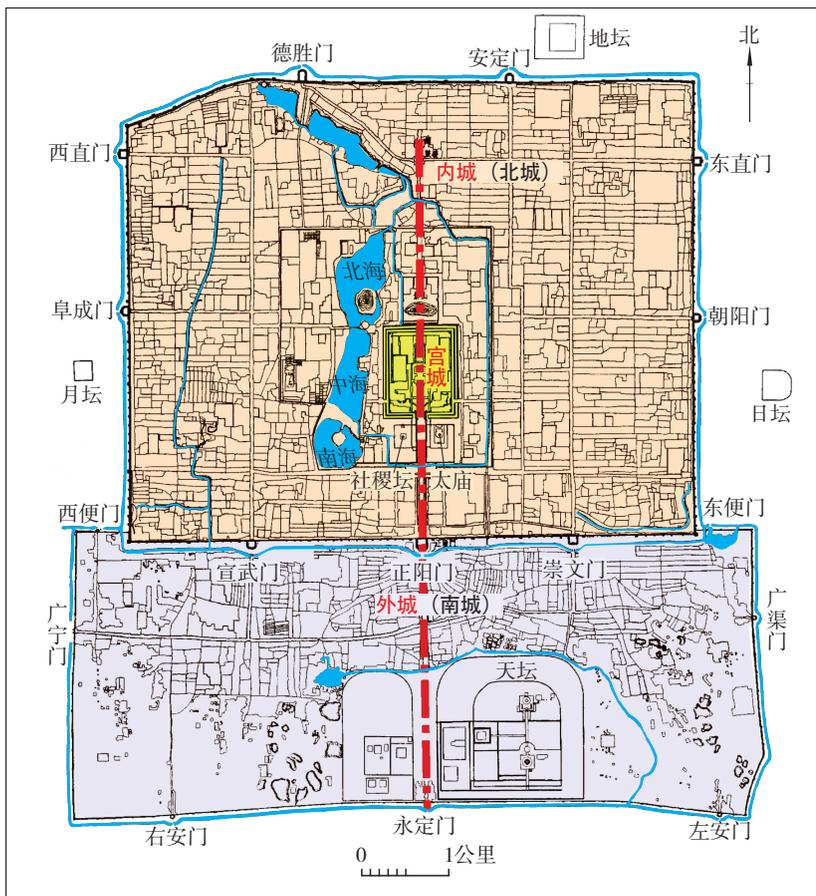
明北京城增建南城，本是加强防御功能，形成环套的格局。但因客观原因而无意中形成“日”字形格局。清北京城作为首都，完全承袭明北京城的“日”字形格局（图一〇）。文献载，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八月辛亥，“谕户部等衙门：京城汉官汉民原与满洲共处，近闻争端日起，……此实参居杂处之所致也。……除八旗投充汉人不令迁移外，凡汉官及商民人等，尽徙南城居住”<sup>[47]</sup>。《清世祖实录》卷四十有类似记载<sup>[48]</sup>。依据文献可知，在清初，皇帝和贵族圈占北京内城（即北城），使之成为满族

皇帝和贵族的集聚地。除满蒙八旗外，也有汉八旗官兵居住<sup>[49]</sup>。而外城（即南城）则是清朝汉人、汉官、回民和工商业者的集中聚居区。尽管清北京城和明北京城形制布局完全一致，但是统治理念明显不同。因此，满族统治者在使用清北京城时，北城和南城失去了原来所谓“内城”和“外城”的意义，而是“分族居住”形成明确的“日”字形双城制。从这个角度讲，清北京城从形式到理念，显而易见贯彻了“辽上京规制”的“因俗而治”统治思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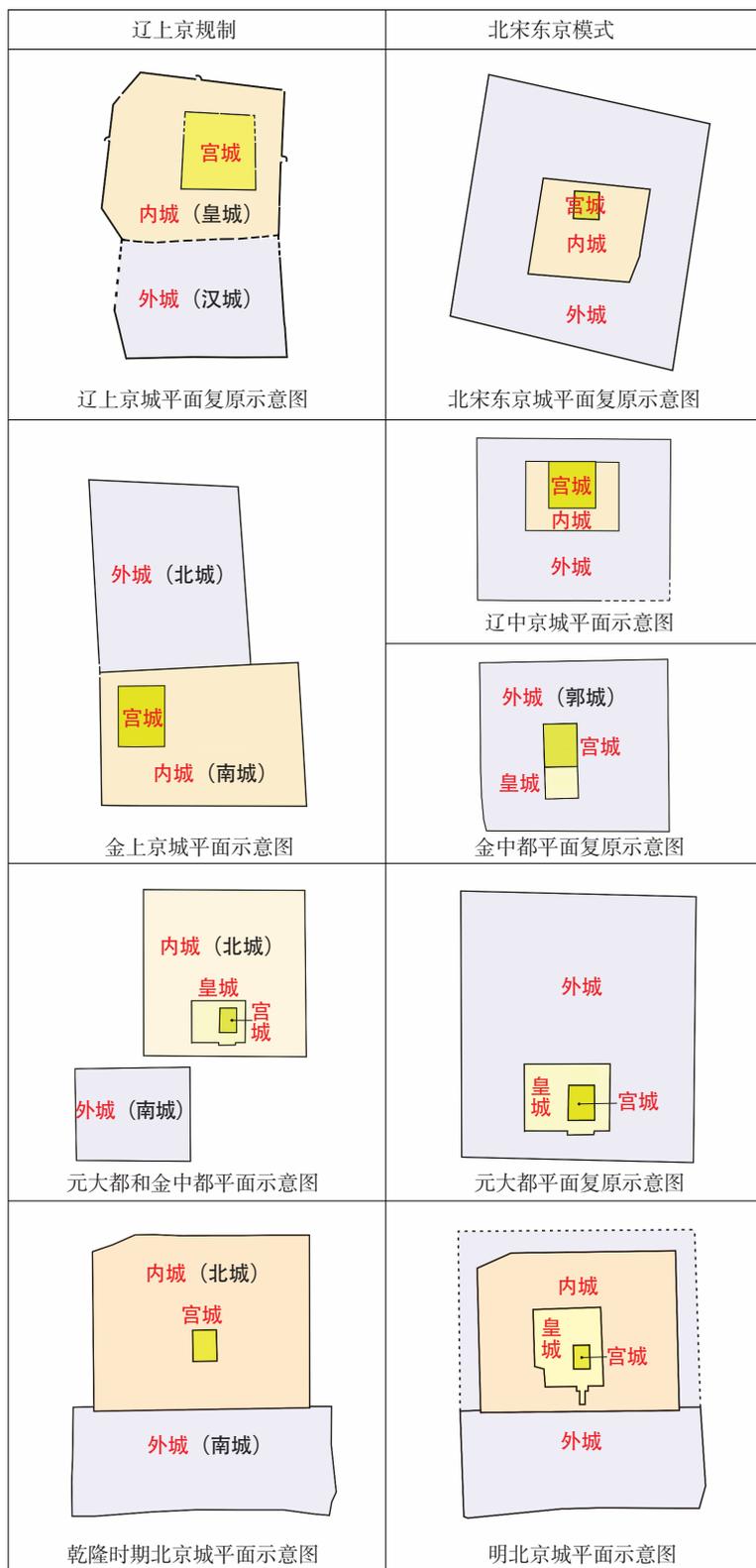
## 五、余 论

唐朝以后，中国都城制度出现了两套系统（图一一）。以“日”字形平面布局为特征

的“辽上京规制”的形成，堪称中国北方草原游牧文化传统和中原农耕文化传统在都城规划设计方面相融合的杰作，是北方少数民族统治以汉人为多数的帝国时“因俗而治”政治制度的物化表象形式。这似乎反映出北方民族建立的帝国初期还存在民族隔阂的色彩。辽、金、元、清诸帝国都城规划或使用理念一脉相承。以“回”字形平面布局为特征的“北宋东京模式”，是汉族皇帝建立的帝国突出“皇权至上”思想的物化表象形式。折射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核心要素——中央集权



图一〇 清乾隆时期北京城平面图  
（改绘自注释[37]图四）



图一一 “辽上京规制”和“北宋东京模式”两套都城规划系统示意图

为特色的官僚体制。辽帝国和金帝国中期以后的辽中京和金中都二城，以及元大都城都明显表现出更好地承继了“北宋东京模式”，更为强调“中国威仪之尊”的情况，展现了以汉文化为主旋律的中华传统文化强大的影响力和兼容性，反映了胡汉民族不断融合和走向统一的大趋势。明清北京城更是统一多民族的中华帝国形成的象征。

附记：本文插图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汪盈绘制，王岩协助部分工作，谨致谢忱。

#### 注 释

- [1] 宿白：《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考古》1978年第6期。
- [2] 同[1]。
- [3] [元]脱脱等撰：《辽史》卷三十七《地理志》第438页，中华书局，1974年。
- [4] 辽上京“皇城”是《辽史》对北城的称谓。实际相当于北宋东京城和明清北京城的“内城”。
- [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宫城城墙2014年发掘简报》，《考古》2015年第12期。
- [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

- 究所:《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宫城东门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17年第6期。
- [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宫城南门遗址发掘简报》,见本刊本期。
- [8] 董新林等:《考古发掘首次确认辽上京宫城形制和规模》,《中国文物报》2015年2月4日第8版。
- [9] 董新林等:《辽上京城址首次确认曾有东向轴线》,《中国文物报》2016年5月6日第8版。
- [1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皇城西山坡佛寺遗址考古获重大发现》,《考古》2013年第1期。
- [11] 汪盈、董新林:《辽上京皇城和宫城城门遗址浅析》,《华夏考古》2018年第6期。
- [12] [元]脱脱等撰:《辽史》卷四十五《百官志一》,中华书局,1974年。
- [13] 贾鸿源:《唐长安三朝五门布局考》,《唐史论丛》第二十五辑,三秦出版社,2017年。
- [1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故城队:《河南洛阳市汉魏故城太极殿遗址的发掘》,《考古》2016年第7期。
- [15]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渤海上京城:1998~2007年度考古发掘调查报告》,文物出版社,2009年。
- [16] 徐莘芳:《中国古代城市考古与古史研究》,见《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之整合研究》(历史语言研究所会议论文集之四),1997年。
- [17] [宋]孟元老撰,伊永文笺注:《东京梦华录》,中华书局,2006年。第一页卷第一《东都外城》载,“新城南壁,其门有三:正南门曰南薰门,城南一边,东南则陈州门(宣化门),傍有蔡河水门;西南则戴楼门(安上门),傍亦有蔡河水门。……东城一边,其门有四:东南曰东水门,乃汴河下流水门也。……次则曰新宋门(朝阳门);次曰新曹门(含辉门);又次曰东北水门,乃五丈河之水门也。西城一边,其门有四:从南曰新郑门(顺天门);次曰西水门,汴河上水门也;次曰万胜门(开远门);又次曰固子门(金耀门);又次曰西北水门,乃金水河水门也。北城一边,其门有四:从东曰陈桥门(长景门);次曰封丘门(永泰门);次曰新酸枣门(通天门);次曰卫州门(安肃门)”。孟元老所记城门名称多为俗称,括号内则为《宋史》卷八十五《地理志》之官方名称。
- [18] a.开封宋城考古队:《北宋东京外城的初步勘探与试掘》,《文物》1992年第12期。  
b.刘春迎:《北宋东京外城上的瓮城及其形制考略》,《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
- [19] a.刘海旺等:《河南开封宋东京城顺天门(新郑门)遗址》,见《2017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18年。  
b.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河南开封北宋东京城顺天门遗址2012~2017年勘探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19年第1期。
- [20] 开封宋城考古队:《北宋东京内城的初步勘探与测试》,《文物》1996年第5期。
- [21] [元]脱脱等撰:《宋史》卷八十五《地理志》第2102页,中华书局,1977年。
- [22] 20世纪90年代曾有人提出宫城外有皇城的观点,目前文献和考古资料均无可靠证据。故本文仅谈宫城形制布局。参见[19]b。
- [23] a.丘刚:《北宋东京三城的营建和发展》,《中原文物》1990年第4期。  
b.田凯:《北宋开封皇宫考辨》,《中原文物》1990年第4期。
- [24] a.孟凡人:《北魏洛阳外郭城形制初探》,《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2年第4期。  
b.钱国祥:《汉魏洛阳故城沿革与形制演变初探》,见《21世纪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 [25]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哈尔滨市阿城区金上京皇城西部建筑址2015年发掘简报》,《考古》2017年第6期。
- [26]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哈尔滨市阿城区金上京南城南垣西门址发掘简报》,见本刊本期。
- [27] 赵永军:《金上京城址发现与研究》,《北方文物》2011年第1期。文中采用《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词条的观点,提及午门内的中轴线上有5个宫殿基址。笔者认为这5处基址不都是宫殿址,可能包含门址和宫殿址两类,有待考古发掘确认。

- [28] 同[25]。
- [29] [元]脱脱等撰：《辽史》卷三十九《地理志》第481、482页，中华书局，1974年。
- [30] a.李逸友：《辽中京城址发掘的重要收获》，《文物》1961年第9期；《宁城县大明城辽中京遗址》，见《中国考古学年鉴（1987）》，文物出版社，1988年；《辽中京遗址》，见《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第279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b.内蒙古自治区昭乌达盟文物工作站：《辽中京遗址》，《文物》1980年第5期。
- [31] 目前依据的是考古钻探资料。因此宫城的形制和位置是否准确，还有待以后考古发掘资料验证。
- [32] 赵永春辑注：《奉使辽金行程录》第18页，商务印书馆，2017年。
- [33] [元]脱脱等撰：《金史》卷八十三第1862页，中华书局，1975年。
- [34] [清]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订补本）第630页，中华书局，2001年。其文载，“金、元取中原后，具有汉人、南人之别。金则以先取辽地人为汉人，继取宋河南、山东人为南人；元则以先取金地人为汉人，继取南宋人为南人”。辽朝的渤海族人、汉族人在金朝均称为汉人。
- [35] 阎文儒：《金中都》，《文物》1959年第9期。
- [36] 齐心：《近年来金中都考古的重大发现与研究》，见《北京文物与考古》第四辑，1994年。
- [37] 徐莘芳：《古代北京的城市规划》，见《中国城市考古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 [38] a.徐莘芳：《元大都的勘查和发掘》，见《中国城市考古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b.同[37]。
- [39] 参阅[34]。
- [40] [明]宋濂等撰：《元史》卷一三〇《不忽木列传》第3169、3170页，中华书局，1976年。
- [41] [明]宋濂等撰：《元史》卷十三《忽必烈本纪》第274页，中华书局，1976年。至元二十二年（公元1285年）二月，“诏旧城居民之迁京城者，以贵高及居职者为先，仍定制以地八亩为一分；其或地过八亩及力不能做室者，皆不得冒据，听民作室”。
- [42] a.侯仁之：《元大都城与明清北京城》，《故宫博物院院刊》1979年第3期。  
b.徐莘芳：《明北京城》，见《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第331、332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 [43] [瑞典]喜仁龙著，刘颖译，杨新成校：《北京的城墙与城门》第36页，人民日报出版社，2018年。
- [44] [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四十第884页，中华书局，1974年。目前学术界通常认为，皇城正南门为承天门。承天门之南有大明门。二门之间有千步廊，两侧有围墙封闭。
- [45] 同[44]。目前学术界通常认为，宫城正南门为午门。午门南有端门，再南为皇城正南门承天门。
- [46] 张先得：《明清北京城垣和城门》，《北京文博》2000年第2期。
- [47] 《东华全录》卷十一，页三上至下，光绪丁亥（十三年，公元1887年）钦文书局重刊本。转引自徐莘芳：《中国古代城市考古与古史研究》，见《中国城市考古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 [48] 《清世祖实录》卷40，顺治五年八月辛亥，中华书局影印，1985年。
- [49] [清]于敏中等：《日下旧闻考》卷三十九《皇城》，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此文记载清朝的“明北京皇城”城墙仍在，但在清早期，很多苑囿已经不再是皇家禁苑，而被改为佛寺或民居，允许平民出入。故本文将其归为内城的一部分。

（责任编辑 刘 昶）